

在認同的河流中漂流

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流れを漂う
In the Flow of Identity

文·圖 | 利格拉樂·阿媯 (作家)

最近《賽德克·巴萊》一片挾高水準、高成本製作以及國片之姿，在台灣引發了一陣觀賞熱潮。不能免俗地，我當然也前往電影院觀看，雖然非常不喜歡人擠人的電影院，但，畢竟這是敘述台灣原住民族歷史的重要電影，總是不能缺席。

抉擇認同的矛盾與痛苦

電影情節不需贅述，有興趣的朋友買張票去看看就對了。除了這個歷史事件的重現之外，其實最讓我個人深思的，反倒是片中花岡一郎與二郎的身分與抉擇；霧社事件的故事，我早在大約20年前，就透過了鄧相揚與邱若龍二位前輩口中得知一二。印象還很清楚，當相揚大哥坐在他位於埔里醫事所的二樓，緩緩提到這二位視部落為族人、日人為恩人的糾葛心情時，一時之間，午後的寒冬二樓竟鴉雀無聲，在場聆聽這段往事的人，誰也說不出自己心中的複雜情緒，只能靜靜地沉澱。

當年的我，年紀未長，大約的情緒就是停留在受殖民的原住民族人

無所選擇，殘酷的總是那些外來殖民者，竟使用了以蕃治蕃的策略，讓當下的人們左右為難；多年後，我走進電影院，看著這一部早在20年前就知曉的歷史戰爭，重新觀看以畫面呈現的花岡一郎與二郎，竟是完全不同的感受，而忍不住潸然淚下。

人，是情感投射的動物；之所以會對於人在抉擇認同一事上有如此深刻的情緒，在於我



筆者家中的長輩們。



筆者將小時候「離家出走」的經歷與心情寫成《故事地圖》，憶起語言不通的外婆用一則一則的故事和古調陪著筆者成長。

自身的成長經驗，當然，那遠遠不及於花岡一郎與二郎在霧社事件中的矛盾與痛苦，最後甚至必須以自殺做為了結；但身分認同路上所面對的掙扎，我卻從未少過。

隱藏身分 成長歲月中的緊箍咒

我的父親與母親不僅僅是不同的族群，在國民政府遷台以前，他們甚至是二個不同的國家，一個來自中國的外省人與一個世居島嶼南方部落的排灣族女子，需要多少的因緣巧合與

時代背景，才有可能遭遇在一起成為夫妻？可巧他們偏偏就遇到一塊兒了，所有的歷史故事，都是小小人民生命的積累，發生在我父母親身上的怪誕情事，正是凸顯出那個大時代中的荒謬性。

從小在眷村成長，記憶所及的童年印象，都是在「山地人」、「番仔」的稱呼中度過。同儕的孩子雖然不甚清楚那些名詞代表的是什麼；在大人們的教導下，卻仍是謹守不成文的規章，拒絕和我與妹妹一同玩



看著《賽德克·巴萊》這一部早在20年前就知曉的歷史戰爭，重新觀看以畫面呈現花岡一郎與二郎的身分與抉擇，竟忍不住潸然淚下。自身成長經驗雖遠不及他們的矛盾與痛苦，但身分認同路上所面對的掙扎，我卻從未少過。



要。那樣的童年，充滿了自卑、不悅和分裂；母親諄諄告誡著：「在學校裡千萬不要告訴別人你的媽媽是山地人。」這像緊箍咒一般，牢牢地箍著我與妹妹的成長歲月，曾經有過一段時間，我真的以為這個咒語將永遠的套在自己身上，無解！

事後，每當我憶及這段過往，心中總是五味雜陳，因為這樣的成長經驗，讓我提早看清了「種族歧視」的現實，應是愉快的童年歲月變得不再快樂；卻也因此，讓我更快踏入了身分認同的泥沼，開啟認識身上不同血緣的另一扇視野——這究竟是幸或不幸？直到現在，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相較起一路順遂的一般孩子，這樣的成長經驗更具衝突性，一路走來的辛酸與撕裂，實在是無法向外人道來。

從孩子的眼裡 看見當年的母親

我還清楚記得那些夢裡的畫面，許多青少年時期的夜裡，在一片黑暗中，同村的孩子拿著石頭向我扔來，耳邊盡是嘲笑的謾罵聲，當我鼓足勇氣想要反擊時，眷村裡的外省媽媽雙手插著腰，箭步地衝到我面前大叫著：「你這個山地小孩想幹嘛？沒文化又沒教養的孩子！」然後，是我哭著跑回家去，對著排灣族的母親咆嘯說：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害我變成山地人，你這個番婆！」那些噩夢持續了好些年，一直到我們搬離了眷

村，可怕的夢境才漸漸地失去蹤影，不再來騷擾我幼稚而薄弱的心靈。

那些年，不夠成熟的我，只注意到自己所遭遇的對待，並不清楚原來母親受的傷害更深、更巨大。直到很多年之後，當我自己也成為母親，這才看見孩子眼中的自己，有多麼害怕被唾棄與被遺忘；也才真的看見當年那個被我咆嘯的母親，有多麼的委屈和無奈——什麼樣的母親可以忍受自己的孩子對峙怒吼？又是什麼樣的社會才會扭曲出這樣的親子關係呢？當身上的血統成為一種汗名的代表、歧視的來源，母親能夠用什麼樣的教育來告訴我：你是值得驕傲的排灣族長女。那些母親從小被教導的排灣族知識、家族長女的榮光、耆老母語裡的文化傳承等，在被外來文化的刻板印象所誣蔑後，她該如何理直氣壯地繼續告訴自己的女兒，這所有的一切不過是一種殖民手段，無須在意更無須否定自己呢？

我的母親是被極度汗名的一代，她不清楚也沒有能力理解走出部落後的社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只能被迫接受所有的不公不義，就如同她必須認命地接受被安排的婚姻，嫁給一個年紀大到足以成為父親的丈夫；更無力的是，還得面臨孩子遭遇歧視時回家對她的種種指控。我不知道母親怎麼熬過這樣一段艱苦的過程，但是當我長大必須承受如母親一般的命運時，卻無法忍氣吞聲地與這一切妥協。



恢復原住民傳統名字是一種宣示，我的孩子因為傳統名字在學校引來側目，也間接揭開了隱藏在多元文化社會裡的謊言——這個社會真的沒有歧視了嗎？還是它只是小心翼翼地被包裝在尊重的糖衣之內呢？



屏東縣來義鄉文樂村的部落入口。

部落經驗缺乏 汙名教育難解

勇氣，有時候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；再怎麼勇敢，現實還是能讓人怯懦不前。我還記得，自己剛剛開始對外宣稱原住民身分時，一般人露出怪異又複雜的眼神，宛如見到一頭怪物般地奇異又困惑，怎麼會有人寧願放棄「外省二代」的族群優勢，選擇極為弱勢的「番仔」身分？

強化對於自己族群的認同，才是支撐繼續走下去的力量，但說來容易，真的操作起來可是異常辛苦。尤其對於一個從小不曾部落生活的原住民來說，生活經驗、部落記憶和二分之一血緣，都不足以化解自小耳濡目染的汙名教育。有好幾次，我幾乎就要放棄走來艱辛的認同之路，回歸父親的外省二代身分。

是什麼力量讓我從解構外省二代到建構成原住民女性？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，當然是在於自己成為母親之後。被遺忘的焦慮感，在第

一個孩子呱呱墜地之後，如螞蟻啃噬般地令人發疼，青少年時期侵襲我的噩夢再度來訪；而現在的孩子有沒有如我一般的經驗呢？在台灣號稱已然多元文化的現在，「種族歧視」一詞似乎應該不再存在，我曾經有過的掙扎與矛盾，在現在的孩子身上彷彿不該繼續，然而，我依然在我的孩子成長過程中，看見了似曾相識的影子。

多元文化糖衣下 認同之路仍坎坷

恢復原住民傳統名字是一種宣示，我的孩子因為傳統名字在學校引來側目，也間接揭開了隱藏在多元文化社會裡的謊言——這個社會真的沒有族群歧視了嗎？還是它只是小心翼翼地被包裝在尊重的糖衣之內呢？成長過程中備受歧視的孩子回家不用抱怨，只消從他們受傷的眼神中就可以窺見。台灣的大環境一天沒有真心欣賞和尊重原住民族，原住民的孩子就得要承受一天傷重的心靈。身分認同來自對於自身族群的驕傲感，究竟要到什麼時候，我們的孩子才能勇敢大聲地喊出：「我是原住民！」從我的母親到我，從我到我的孩子，我依然還在等待著，那條身分認同之路，將不會如此地崎嶇坎坷。◆



利格拉樂·阿媽

排灣族，成長於眷村，後隨母親回到屏東縣來義鄉文樂村布朱努克部落，1969年生。除文學創作外，曾於靜宜大學與亞洲大學任教，並從事原住民媒體相關工作。曾於原住民電視台主持談話性節目，並製作專題報導與主持電台節目。現職為文字工作者。著有《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》、《紅嘴巴的Vu Vu》、《穆莉荻MULIDAN——部落手札》、《故事地圖》。